

新实体经济赋能中国经济现代化： 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夏杰长¹ 肖宇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摘要: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 实体经济的内涵与范围不断拓展。作为人类技术的新范式,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三次产业的传统生产范式。数字技术的软硬件开发、以“三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化以及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所构成的产业数字化共同构成了新实体经济。新实体经济助力中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逻辑主线, 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环节之后, 成为创新理念落地的主要载体, 通过数字化赋能再造, 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发展新实体经济需要充分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作用, 补齐新实体经济底层关键技术匮乏的短板, 以数字技术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积极参与新实体经济的国际治理体系。

关键词: 实体经济; 新实体经济; 经济现代化; 数字经济; “卡脖子”技术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3) 03-0001-09

引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将此确定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那么,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呢? 对此,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做了明确的回答: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 习近平把中国式现代化概括为五个方面, 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 强大的物质基础是最基础的支撑条件。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就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2073139);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 (2022YQNQD054)。

作者简介: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方向: 服务经济、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 肖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 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年, 第22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年, 第22-23页。

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全体人民的美好愿望。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脱实向虚”只会带来经济的表面繁荣甚至经济泡沫，实体经济则是强国之本、兴国之基、产业之根，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和支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② 当今世界，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现代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实体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也正在被拓展或被赋予新内容。毋庸置疑，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和工业依然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但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数实融合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内涵和范围正在拓展，“新实体经济”应运而生。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赋予实体经济新内涵，拓展实体经济的发展业态和领域，通过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是学界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议题。

一、对实体经济的新认知

数字技术是继工业时代、电器时代之后出现的技术新范式，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三次产业在数字技术冲击之下日益呈现新的产业形态和发展模式。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即“三新经济”）通过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重塑传统经济范式、创新经济发展方式、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和夯实实体经济之基的重要力量。以数字经济领域为例，数字经济规模在中国实体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攀升。2012—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1.6%提升至39.8%。^③ 即使如此，考虑到融合发展新业态在统计测算中极易出现错统、误统和漏统的现象^④，尤其是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在三次产业的普及渗透，中国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可能被大大低估了。

由于数字经济的体量如此之大、辐射范围如此之广且融合程度如此之深，数字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性日渐增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中国正处于进入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如何推进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成为目前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关切问题。^⑤

数字技术出现后，经济社会各层面高度互联互通，各种资源广泛重新聚集整合，大量新型服务业迅速成为市场主流，并以强大的力量改变着传统服务业。^⑥ 这一变化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也同样普遍。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产业发展，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不能忽视的变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两步走”的奋斗目标，到21世纪中叶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⑦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依靠现代产业体系这一重要依托，数字技术和数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页。

^③ 苏德悦：《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5万亿元 占GDP比重达到39.8%》，《人民邮电》2022年7月11日。

^④ 肖宇、夏杰长：《数字贸易的全球规则博弈及中国应对》，《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⑤ 夏杰长：《“两步走”战略视角下中国服务业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和推进策略》，《企业经济》2021年第10期。

^⑥ 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增长》，《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⑦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数字经济不仅正在改变现代产业的特征和内涵，也将对传统实体经济重新进行界定和赋能。

因此，界定数字时代的新实体经济范畴，深入探讨新实体经济与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最终找到通过新实体经济助力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可行性路径，是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新实体经济的范畴界定和分类框架

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价值总量的体现，实体经济是指围绕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以数字平台经济为主要代表的新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随着“数实融合”的不断深入，可能需要重新界定实体经济的外延和内涵。

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西方管理学中有实体经济和符号经济的概念，但实体经济更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词汇。^① 围绕实体经济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实体经济的概念界定和重要性两方面。在具体研究中，一个经典做法是把实体经济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即制造业；二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包括制造业、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工业；三是指实体的整体内容，包括前两个层次和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住宿餐饮以及除金融、房地产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务业。^②

这一划分把金融和房地产排除在实体经济范畴之外，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和几次房地产泡沫之后，这种划分方式一度较普遍。这种认识主要源于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引致的经济泡沫，继而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③ 尤其是在“资管新规”出台前，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一个关注的焦点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损害。研究发现，银行融资对冷性市场扭曲和热性市场扭曲具有显著作用。^④ 即使如此，学术界也未就虚拟经济发展不利于实体经济的论断达成共识。比如，有定量分析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规模和活性上相互作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⑤ 在对负向影响效应的进一步研究中，有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差异，以及股市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之间的非对称性。^⑥ 这种非对称性的根源在于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对此，我们应围绕金融的基本功能来重新审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命题，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进一步理顺利率、汇率和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等媒介资源配置的市场基准，建立稳定的筹集长期资金和权益类资本的机制。^⑦ 有趣的是，虽然当前学术界的普遍做法是把金融划分在实体经济之外，但有学者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业态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助推作用，这种作用渠道的发挥依赖于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获取中小企业信用数据、交易行为数据，从而为符合条件的个人或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⑧

这些研究实际上指向了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发展

① 张晓晶：《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 黄群慧：《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9期。

③ 李晓西、杨琳：《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财贸经济》2000年第6期。

④ 罗来军、蒋承、王亚章：《融资歧视、市场扭曲与利润迷失——兼议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

⑤ 刘金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联性的计量检验》，《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⑥ 刘骏民、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对我国当前股市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一种解释》，《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⑦ 李扬：《“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辨》，《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⑧ 何师元：《“互联网+金融”新业态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联度》，《改革》2015年第7期。

的新范式，实现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深度发展的新时期，数字技术通过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创新重塑了传统的经济范式，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①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数字化特征鲜明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在实体经济中的定位和扮演的角色。毕竟，在生产要素约束日益趋紧的大背景下，只有依靠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才能够直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数字经济出现之后，俨然成为中国创新驱动战略落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和新发展格局顺利推进的重要体现。

在此类研究中，有学者以中国31个省级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究了2013—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发现，虽然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且在区域间存在差异性，但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呈现逐年持续上升的态势。^②在更微观案例研究发现，传统零售业向新实体零售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新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容和趋势，其实现路径主要表现为从要素数据化、数据赋能智慧化到数字化治理的过程，而新实体零售业成长是零售业“技术—经济范式”的表现。^③为了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需要建立体制机制，破解数字鸿沟较大、“护城河”技术短板、寡头平台垄断等现实问题。^④

在近期研究中，有学者基于“数字化转型—企业发展方向—赋能实体/加剧金融化”的理论框架，系统论证和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真实经济影响。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投资水平，抑制“脱实向虚”，且数字化赋能有助于企业培育“专精特新”的深耕式发展模式，提升其专业化优势。^⑤从具体路径来看，数字化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侧重于促进企业绩效提升、提升治理效能、创新企业治理结构和推动企业创新发展。^⑥在更中观的行业和城市层面，有研究测度了2011—2016年中国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后发现，数字经济的积极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以及空间溢出的特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⑦实际上，在现代经济中，数字技术以及与此相关的IT技术对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⑧和对区域经济创新发展^⑨的影响尤为深远。在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三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即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更好的匹配机制与创新激励。^⑩

在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期，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越来越弱，而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推广应用，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业态，使过去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农业领域，借助于数字智能感知技术，农业生产的精准化、农业经营的网格化和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在工业生产领域，数字技术使更加敏捷化、柔性化的生产成为可能，不仅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改善了客户体验，提升了客户粘性。在服务领域，数字技术的出现，使“鲍莫尔成本病”的成立逻辑彻底受到挑战。^⑪因此，把数字经济以及数字经济出现之后日益广泛的

① 洪银兴：《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维度》，《管理世界》2022年第4期。

② 张帅等：《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经济地理》2022年第7期。

③ 王小平、刘佳、韦巍巍：《数字经济时代新实体零售业成长的微观机制研究——基于“良品铺子”和“三只松鼠”双案例分析》，《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4期。

④ 张楷卉：《“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机制》，《经济体制改革》2022年第4期。

⑤ 李万利、潘文东、袁凯彬：《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9期。

⑥ 何帆、刘红霞：《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改革》2019年第4期。

⑦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⑧ 肖宇：《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国三次产业创新增长的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8期。

⑨ 夏杰长、姚战琪、徐紫嫣：《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6期。

⑩ 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学家》2019年第2期。

⑪ 肖宇、夏杰长：《数字经济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中国金融》2022年第7期。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认定为实体经济的构成部分，具有扎实的理论根基和现实基础。

对于数字技术在新一轮产业变革和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中的重要影响，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讲话时明确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①。加快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共识，在实践层面日益深化。

从这一角度来看，除数字技术本身以及已大量出现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产业化之外，也把数字技术在农业、工业和制造业、服务业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中表现出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界定为新实体经济。在微观层面赋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中观层面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化，依托数字创新实现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在宏观层面通过数字化发展，打造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能。依托数字技术和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继续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普遍认知。

新实体经济的具体层次表

划分	含义	具体产业形式
第一层次 (NR_1)	数字技术本身产业	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的信息、计算机、通信技术与设备等软件和硬件制造
第二层次 (NR_2)	“三新”经济	基于数字技术产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第三层次 (NR_3)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	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数字化转型

具体来说， NR_1 层次的实体经济指决定数字经济根基的数字技术的硬件制造和软件开发产业，这是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而诞生的全新产业，本文将之界定为最狭义的新实体经济。

NR_2 层次的实体经济，同样是相对狭义的概念，仅指基于数字技术而新发展的“三新经济”，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新产业”指应用新兴技术直接催生的新产业、传统产业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形成的新产业以及由科技成果推动产业分化、升级、融合而衍生出的新产业；“新业态”指顺应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依托技术创新和应用，从现有产业和领域中衍生并叠加出的新环节、新链条、新活动；“新商业模式”具体表现为将互联网与产业创新融合，把硬件融入服务以及提供消费、娱乐、休闲、服务的一站式服务，是高效并具有独特竞争力的商业运行模式。^②

NR_3 层次的新实体经济是一种更广义的范畴，是指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之下，数据进入生产要素后，传统产业进行的数字化赋能改造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经济形态，突出表现为三次产业生产流程的优化、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满足、快速敏捷的柔性化产业链供应链的构建以及高效、智能和便捷化的生产—物流—消费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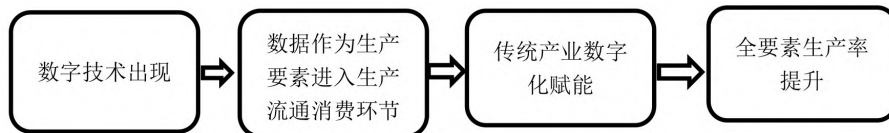
三、新实体经济助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机理

根据前文分析，第一层次新实体经济概念，指数字技术本身的软硬件产业；第二层次相对狭义的新实体经济范畴，指借助于数字技术而产生的以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形态的集合，即“三新经济”；第三层次是广义范围内的新实体经济，指三次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具体表现为产业数字化，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的数字化赋能再造。中国正处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设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深入认识日益普遍的数字化对现代产业体系的影响，厘清新实体经济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4页。

② 张翼：《“三新”经济增速高于GDP增长》，《光明日报》2022年7月31日，第4版。

从演进逻辑来看,数字技术作为机器大工业和电力时代之后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过去的生产组织范式。如图所示,借助于先进的算法、大型计算机和便携式移动终端,数字技术正在全面融入三次产业。通过数据的交易流通,传统产业得以通过数字化转型进行赋能再造,继而形成新的增长曲线,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新实体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逻辑示意图

作为主要用于衡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增长超过要素投入增长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源于专业化分工、生产改良、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①因此,当前学术界普遍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创新增长的替代指标。^②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习近平在2016年1月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做到的。”^③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④因此,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必须走创新发展的道路。沿着这一逻辑主线,新实体经济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路径日益清晰。

首先,新实体经济是创新理念真正落地的重要支撑。就历史沿革而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是趋势。从第三层次的新实体经济概念来看,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数字技术出现之后,过去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习惯被彻底重塑,通过对生产流程的数字化改造,生产企业不仅可以对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消费需求给予快速响应,而且可以优化企业内部的管理流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库存和实现高效的资金周转。按照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数字化出现之后,企业完全可以在总的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对狭义的第二层次新实体经济范畴作为“三新”经济的主要集合,更多体现为一种新的发展形态,这些新业态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主要载体,鼓励该层次新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创新增长。新实体经济的最基本范畴是数字技术的软硬件研发及由此形成的产业集合,作为人类技术范式变革的主要驱动力量,其本身即创新的组成部分,也是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新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贯彻创新的发展理念离不开新实体经济。

其次,新实体经济是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内循环的主要抓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演变,世界经济的复苏乏力,外部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过去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越来越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中国经济实力的跃升和巨大的市场资源优势,为塑造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高品质、个性化和多元化的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需求传导到生产端,需要企业调整过去赖以习惯的生产组织方式,依靠数字化技术重塑生产流程,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

① 肖宇、夏杰长、倪红福:《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

② 夏杰长、肖宇、李诗林:《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再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③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80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5页。

的需求。实际上，借助于数字化的流程再造，无论是农业产品的订单化生产，还是工业企业的柔性化制造，或是服务业企业快速的服务需求响应，都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的体验。企业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开发的新产品甚至引导和“创造”了消费者新的需求。在新发展格局下，新实体经济极大地拉动了内需，将消费者的消费留在国内市场。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大力发展新实体经济是拉动内需，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均衡，继而畅通内循环的重要渠道。

最后，推动新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需要处理好对外开放和内循环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有加强的态势。尤其是在芯片、生物医药、发动机、材料、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领域的“卡脖子”现象尤为突出，严重影响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需要塑造中国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和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由于存在需求方规模经济，新实体经济具有明显的“强者恒强、跨界融合”的典型特征，一旦形成规模优势，则后者几乎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在以市值为标准衡量的全球前十大上市公司中，以新实体经济为代表的企业已经初露锋芒，站在和传统的能源、金融巨头的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既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所以，抓住新实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积极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锁定国际竞争的先发优势，对中国尤为重要。

四、新实体经济赋能经济现代化的实施路径

1. 充分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

从全球来看，由于新实体经济的范畴基本都属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三个层次中的数字经济为例，主要发达国家都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构建现代经济体系，重塑未来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主要抓手。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实体经济已俨然成为重组生产组织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变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新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力量，需要对新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好相关制度设计。

新实体经济的发展涉及数据生产要素交易、新业态的行业监管、行业垄断、消费者保护、网络空间治理、全球数字规则制定等从国内到国外、从微观主体到行业和宏观的各方面，对于制度的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作为新生事物较集中的领域，中国新实体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未有效弥合，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数据资源规模庞大，但价值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因此，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围绕新实体经济的短板出台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强大的先发优势，牢牢占据未来全球竞争的优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走上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也积累了制度创新的大量经验。但现代数字技术所具有的高通量、低延时和融合性的特征，使其具有和工业经济时代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律。这需要我们构建新的制度框架，以适应现代信息网络、智能算法、数据资源价值变现及隐私保护等新实体经济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自身的发展特征。在经济制度的设计中，生产要素的设计属于根本性基础。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将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并列，明确数据是一种新型要素，为数据参与收益分配扫除了制度上的障碍，也为新实体经济的发展夯实了制度基础。

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应坚持创新的思维，抓住数据生产要素流动这一主线，在上海数据交易所试点深入推进中国要素市场配置综合改革，加快建立健全数据要素流通市场机制。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提高数据质量和规范性，丰富数据产品。制定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

推动完善适用于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支持拓展丰富三次产业规范数据开发利用的场景,全面开展全民数字技能提升工程,从而在制度层面释放数字红利,促进新实体经济的发展,夯实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基。

2. 补齐新实体经济底层关键核心技术短板

从广义上来看,新实体经济是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发展起来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集合。考虑到数字技术的出现在物理世界引起的广泛资源重组、结构性变革和竞争格局重塑,主要发达国家都将新实体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数字经济作为未来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发展数字经济的着力点是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就新实体经济的范畴而言,不管是第一层次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软硬件,还是相对狭义的第二层次数字产业化,或是广义上大量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都对数字底层技术的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较为火热的新实体经济赛道,如数字城市、机器学习、自动驾驶、智能家电等,都需要AI芯片硬件、算法程序、操作系统等软件的支持。

目前中国数字经济等新实体经济已经具备较可观的发展规模,但由于中国新实体经济起步较晚,目前这些新实体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即主要在教育领域,而对数字经济底层的支撑技术,比如异构计算^①、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仍然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这种分工格局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即中国新实体经济的发展会受到西方国家的“卡脖子”,从而掣肘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步伐。

补齐新实体经济的关键核心技术短板,离不开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信息产业的自立自强。具体来说,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不断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解决新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缺芯少魂”的突出短板,实现关键核心和底层技术的自给自足,确保核心技术、重要产业、关键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头部企业等安全可控,为经济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3. 以数字技术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坚实保障。但是,现代产业融合发展、协同集聚的现象日益普遍,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与共生互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条件。^②尤其是数字技术出现之后,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流通—消费流程得以重塑,具体来说,在产品的设计环节,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大量产品可以进行数字化建模仿真,提高企业对外部市场的响应速度。在生产环节,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生产过程的可视化,从而大大提升制造环节的信息化水平。在质量管控环节,借助于数字技术的在线监测和算法设计,产品可以实现全流程追溯,而质量控制的端口可以前进至产品生产的同过程。此外,通过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制造业的边际也开始日益模糊,呈现明显向下游消费环节衍生的倾向。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树根互联”打造的“5G+智能制造”发展模式,在该模式下,制造业企业可以及时掌握其所销售的机械设备的地理位置和机器运转情况,并及时提供质量监测和售后增值服务。由此,制造业企业日益呈现服务化的特征,并通过这种服务化的商业模式,实现制造业企业自身的跨越式增长。正因为如此,中国要坚持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的道路,并通过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尤其是引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进口,以此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助力中国制造业走向全球价

^① 异构计算指不同架构组合在一起提供算力,解决数据处理问题的方式。

^② 徐紫嫣、姚战琪、夏杰长:《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区域创新中介效应检验》,《经济纵横》2021年第9期。

价值链中高端。^①

借助于数字技术实现跨界融合的还包括服务业企业。同样，通过数字技术和先进的算法，服务业企业可以及时抓取消费者的个性化、多元化的产品需求，继而通过高效的数据传输，实现精准的柔性化生产，这方面的典型如“京东京造”，“用户直连制造（C2M）智能工厂”，通过人工智能、5G、物联网和云计算，将消费者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快速传导到生产端，根据消费者需求决定生产，提高了生产、消费和流通环节的资源配置效率。^②

因此，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应该鼓励制造业企业通过数字技术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延伸制造业企业的服务链条，推动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形成竞争新优势；而服务业企业也应该抓住数字化的红利，通过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现自身的价值增值。

4. 积极参与新实体经济国际治理体系建设

新实体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在其发展初期必然面临一些治理困境。中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现象和趋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违反法律法规，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和治理。

推动新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坚持支持创新和有效监管相结合。一方面，鼓励新实体经济创新，为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的成长壮大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开展监管创新，设置柔性边界、划分刚性底线，以“负面清单”的模式改进监管技术和手段，明确企业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主体、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考虑到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话语权的重要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尝试将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内规则国际化。以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跨国交易形成的数字贸易为例，当前“美国模板”和“欧洲模板”的各项规则已经较成熟。对此，我们要积极参与和新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国际规则的谈判，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就全球数字治理的议题开展广泛合作。同时在中国牵头主导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中，增加数据的跨境流动、数据存储、跨境数字税收征管、移动支付、电商服务、数字企业反垄断国际合作等领域的“中国方案”，积极倡导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新规则，进一步增强中国对服务贸易新准则的话语权。

责任编辑：刘雅君

^① 徐紫嫣、夏杰长：《服务业开放、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高效融合》，《经济日报》2022年1月4日，第11版。